

被“命名”的意义 ——论安部公房之《蟹甲木》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王 晶

[摘要] 安部公房(1924-1993)是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他凭借超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与“寓言”式的表现形式,摆脱了战后政府和占领军严酷的文字监管与“红色清洗”,深刻地揭露了躲藏在经济发展外衣下人民精神世界满目疮痍的真相。胸怀共产主义理想,解救被囚禁的灵魂,《蟹甲木》反映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比物质剥削更丑恶的精神摧残,还有作家自身沉重的时代使命感以及在“黑暗”中对“光”与“春天”的向往。

[关键词] 安部公房 蟹甲木 超现实主义 共产主义 战后

引 言

发表在《表现》(1949.8)上的《蟹甲木》是安部公房变形系列作品的第一部。发表当年便与岛尾敏雄的《出孤岛记》、三岛由纪夫的《假面的告白》、真锅吴夫的《天命》、田中英光的《野狐》等作品一起,入围了日本第一届战后文学奖。该奖项虽然最终被岛尾敏雄摘得,但《蟹甲木》依然为安部公房在翌年获得该奖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凭借此部作品,年轻的安部公房在日本战后文坛上崭露头角。

小说以主人公 common 君在春日的某一天,偶然在路边踢石子,意识突然出现断层,开始变成一株植物为开端,描写他前后历经4次变形,最终在H植物园长的温室里彻底变为植物,并被园长命名为“蟹甲木”的故事。其创作风格一改处女作《终道标》中存在主义文学的厚重色调,以轻快的天马行空般的故事情节展现出了超现实主义作家特有的写作风格,因此,《蟹甲木》被认为是“安部

公房的文体从存在主义向超现实主义转换的分界点”^[1]。就连安部自己也曾任在随笔中直言:“通过书写而明确了自己创作方向的作品正是《蟹甲木》”^[2]。可见《蟹甲木》在安部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理解整个安部文学世界的一把钥匙。

对于这样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文学作品,学界也曾进行过多角度的阐释与解读。主题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其一,变形为植物这一“植物病”的实质;其二,它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植物病”的实质而言,花田清辉早就坦言,它代表的是“颓废主义”;而田中裕之则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将这种面向内部的“颓废”理解为一种“逃避”,并明确指出这种“逃避”终将导致“自我闭锁”^[3]。与此相对,小林治则更直接地揭示出变为植物与其本质的关系,他认为:“变身就是剥下变身前被隐藏的本质的皮囊,将其展露在可视的现实世界之中”^[4],换句话说,“植物”就是 common 君本质的可视化表现。

关于“植物病”的发病原因,小林治发现变形均是发生在主体“发现自己与自己的身体以二律

背反的方式存在”之时,所以“自我同一性的丧失”是导致“植物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小林治,2000:66)。相比之下,田中裕之的解读则结合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他一针见血的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使人成为可以替代的一只齿轮,剥夺了人的存在根基”,使“common君生‘植物病’的原因正在于‘统治阶级的压制’”(田中裕之,2012:82)。这种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剥削本质,鲜明刻画出国民被统治阶级奴隶现状的文本解读,反映了评论家对作者及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在文本解读多样化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果说“植物病”的本质在于“自我”的丧失,而这种“自我丧失”正是引发 common 君变形的前提的话,那么变形的为什么是 common 君而不是其他被奴役的国民?变形的结果又为什么是“植物”而不是其他东西?其次,如果说变形的根本原因来自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那么,小说中最后为 common 君命名的 H 植物园长是资本主义统治者的隐喻吗?他为什么会在 common 君 4 次变形时采取不同的态度?他又是什么特别地将 common 君作为自己收治的对象呢?安部将自己对当时日本社会阶层的深刻理解融入了这样一部被称为“寓言”^[5]的作品之中,其间包含的各层隐喻关系还有进一步细化讨论的可能。

因此,本研究将在进一步探讨人物的隐喻含义与变形关系的基础上,更透彻地剖析安部通过作品刻画的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图,以期明确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统治阶级精神世界所受到的多重压迫本质,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安部的文学立场以及安部文学的时代意义。

1 common 君的 普遍性 与 特殊性

正如主人公“common”的名字一样,common 君是战后日本社会中一个最具普遍性的小人物。为了渲染这种分不清是“谁”的“普遍性”,作者甚至一反自己常用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叙述形式,而特别使用第二人称来激发读者潜意识深处

的同感与共鸣。

请你想象一下 common 君。你说不可能?怎么可能,不论什么情况都可以啊,像名字那样就行啊。common 君就是 common 君。曾是我的朋友。什么?是你的朋友?当然可以。总之,只要是 common 君就可以了。(笔者译)^[6]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到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的小人物,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长出了枝与叶,变为了一株既不是树也不是草的“植物”。整个变形过程非常偶然,没有特殊的时间与地点,只是在“意识出现断层”的瞬间“脸”发生了“反转”的结果而已。换句话说,小说中“意识”的断层与“脸”的反转是 common 君变为植物的两个必要条件。那么,“变形”为什么会发生在“意识”出现断层之时,又为什么要以“脸”的反转为前提呢?

根据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意识是人心中唯一能够被那个人直接知道的部分”^[7],它由“自我”所控制,只有被“自我”承认的观念、情感、记忆或知觉才能进入“意识”,否则就会被沉入“无意识”之中,永远得不到感知。也正是由于“自我”这个“门卫”严格控制着“意识”所感知的疆界,人才能保证自己的“人格同一性与连续性”。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追求“人格同一性”的过程。因此可以说,虽然个体之间具有“个性”的差异,但就每一个拥有完整人格的个体而言,被“自我”放入“意识”范围内的东西与放入“无意识”的东西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发生变形时的 common 君的“意识”突然出现了“断层”,这意味着“自我”失控,无法正常区分应该放入“意识”与“无意识”区域的心理内容。从这一层面上讲,发生“变形”正是“自我”不在场的直接后果。同时,也正是由于“自我”的不在场,原本由“自我”调控的“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原有的人格被否定。

另一方面,如果说“自我”是“意识”与“无意

识”的分界线,那么“脸”则是每一个个体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分界线。关于“脸”的作用与定义,安部在小说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的脸就是过滤器。和着脸的凹凸,元存在被意识固定了。(中略)在脸之后只有意识不加理睬,是非常可悲的行为。并不是考虑脸,而是用脸来考虑。(安部公房著,笔者译,1997:234)

可以看出,现实世界中“脸”的分界线作用被无限地扩大了,它不再是处于次要地位的信息传输“手段”,转而成为了处于主要地位的信息交互“主体”。它根据自己的“凹凸”来“过滤”信息,在“脸”之后的“意识”已不再被主体“理睬”。它总是朝向外部的现实世界,也同时强迫自觉意识跟着指向外部。“脸”的这种单向性“呈现”与“过滤”作用,导致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彼此用完全不知道的脸生活着”。

发生变形的 common 君在偶然之中打破了这种固定格局,它的“脸”发生了内外反转,这种反转迫使原本一直处于外倾状态的自觉意识转向主体自身。于是,common 君产生了“那个我与这个我弄错了,脸里外颠倒,意识不停地向脸的外侧坠落”般的感受,并突然在自己的内部,在“光溜溜的意识的断层面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样子”。这“样子”起先是在“路边踢石子”的自己,转而是“脚已经完全嵌入地面”“已经变成了植物”的自己。可见,正是由于“脸”的内外“反转”改变了“意识”的指向,主体也从而获得了真正观察“自己”内部的机会。

可以说,“意识”的断层扩大了心理内容的范围,“脸”的转向提供了自觉意识捕捉其内容的可能性,两者互为依存,共同促成了“变形”的发生。虽然正如田中裕之所讲的那样:“变为植物不可能具有积极进步的含义。”(田中裕之,2012:80),但是,通过“变形”,common 君看到了“自己”的真相:已经成为了丧失行动力、控制力、意志力的“非人”,充其量不过是依然还具有生命力的“植物”

而已。

之所以变为“植物”,是因为“植物”就是 common 君的真实生存状态;“植物病”的本质就是由于“自我”丧失而导致的“人格”丧失。那么,是不是只有 common 君生了这种“特殊”的怪病?是不是只有 common 君发现自己得了这种“特殊”的怪病呢?小说的开头,在讲述 common 君的故事之前,作者早已作了铺垫。

不要笑,你终究是那种病。你一直都知道。什么?不需要害怕,有同伴哟。(中略)我们大家都有一颗面向不安的植物。可能是传染病。人变成植物的故事,最近似乎明显增多了。(中略)我觉得,与其说这是病,还不如说这是一个世界,特别是我们的世界……

(安部公房著,笔者译,1997:234)

从上述表达中可以看出,发现自己得这种病的人其实并不少,之所以显得“特殊”是因为患者大都因“害怕”而选择“隐瞒”,也因为彼此“隐瞒”,所以“都认为那只是自己的病”。但实际上,这种貌似“特殊”的“植物病”其实是“普遍”的存在,甚至普遍到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特别是我们的世界……”。“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时在 common 君身上得到彰显,正是这种互为表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才使得安部的“超现实”文学具有较现实世界更为深刻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揭示了日本战后国民表面为“人”实为“非人”的存在本质。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丧失了行动力与意志力,成为了被控制与被奴役的“植物”呢?

2 废墟的心 与政府的绿化计划

不仅是《蟹甲木》,在1949年至1955年之间,作为超现实主义作家的安部公房还曾经创造出了大量的“人”变为“非人”的作品。比如,《赤茧》(1950)中的“人”变为“茧”;《洪水》(1950)中的“人”变为“水”;《S·卡尔玛氏的犯罪》(1951)中的“人”变为“墙”以及《棒》(1955)中的“人”变为

“棒”。但是，与《蟹甲木》中的变形不同，之后的这些作品都是一次性变为目标对象，作者并没有着力刻画主体经过数次变形而后慢慢稳定的过程。可见，《蟹甲木》中的4次变形是作者有意为之，每次变形的差异理应作为作品解读的关键。

如前文所述，common君的第一次变形是在边走路边踢石子这一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common君对它的直接反应是“太讨厌了。发生这么荒唐的事情也可以吗？不好，肯定不好。”从中可以读出common君对变形的否定与不屑。第二次是在咖啡馆，由于变形打扰了自己与心爱的K小姐的约定，所以common君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抗拒：“身体僵硬，拼死抗争已经不能动的身体，终于抓住了脸，扯下它，使表面朝外，瞬间，所有都回到了从前。”然而，这种对自身变为“植物”的否定与抗拒，在第三次变形时却发生了彻底地改变。common君甚至觉得：“变成植物这件事本身也伴有一种快感”，于是下定了决心“就这样变成一株植物吧”。面对前后三次变形，common君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呢？又是什么影响了common君的内心感受呢？这或许可以从第三次变形的发生来思考。

这里是哪？我已经迷路了。很奇怪的地方。山丘上有被烧过的痕迹，烧焦的围墙绵延不绝。从太阳可以看出已经5点了。完全没有人的迹象。
(安部公房著，笔者译，1997:242)

对于第三次变形场所的特殊性，田中裕之曾明确指出：“将‘山丘上有被烧过的痕迹，烧焦的围墙绵延不绝’作为变形发生的舞台，给人一种战争刚结束的印象。”(田中裕之，2012:74)吴美姪也通过研究印证了“废墟”与战争的相关性，她认为：“废墟般的地狱是某种罪，它与战争紧密相连。”^[8]毫无疑问，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人们不得不在废墟之地重建家园。然而，另一方面，比摧毁家园更可怕的是近20年的漫长战争生活同时也

摧毁了所有人的精神世界，人们的内心被鲜血、杀戮、死亡、恐惧所充斥。可以说，“废墟的心”是生活在战后日本社会里人们的共有精神状况。

战争结束，从死亡的威胁中逃离出来的人们，终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渴望在建设家园的同时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图书馆作为精神食粮的仓库，立即吸引了大量民众的目光。用先进的思想与理论给养自己“废墟的心”，真正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剥削的国家恐怕是当时日本国民最大的希望。然而，就在国民寄希望于知识之时，政府却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而将矛头对准了怀揣梦想的战后一代。疯狂的思想镇压与监控几乎遍布了日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如邹波所说：“(安部小说中)符号化的主角面临的生存处境是日本战后社会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历史心境”^[9]，安部的文学反映的正是鲜活的战后日本社会、鲜活的民众生存处境。

在所有人都低头走路的图书馆的走廊里，common君的头低得更深。感到脚已经嵌入涂抹着厚厚油脂的地板里。从身边走过的人似乎都很害怕光。而机械般地保护自己的管理员们，谨慎地监视着面对光而抬起头的无理之人。(中略)只有这里被季节遗忘，春天依然没有到来。
(安部公房著，笔者译，1997:248)

上文寥寥几句将图书馆中的恐怖与挣扎刻画得深入人心。面对“光”，面对“抬起头的人”，“管理员们”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简单粗暴地将其视为“无理之人”并施以残酷镇压。由于小说创作之时，安部公房在思想上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倾斜(顾琦渊，2017:336)，所以，其中的“光”与“春天”可以视为共产主义等先进思想的隐喻。而与此相对，“管理员”代表的应是国家机器，他们“机械般地”维护的正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比战争中的血雨腥风更加黑暗与恐怖的处境描写，是安部对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暴力控制国民思想的无情揭露与批判，其间渗透的是作家对“光”与“春天”的渴望

与向往。

不仅如此,在政府利用国家机器全力阻止国民接触先进思想的同时,他们还利用广播、传单等宣传形式,妄图实施愚民政策。common君在变形过程中反复接触到的政府之“绿化”计划正是统治阶级企图愚弄国民的典型表现。

除了第一次变形之外,其余三次变形都与政府实施的“绿化”计划有关。在第二次变形即将发生之际,common君突然感觉到:“贴在窗户外边电线杆上的传单,意味深长地递了个眼色”。而那张“递眼色”的传单上写的正是“绿化周时间”。像是受到了传单的暗示,common君随即开始了时隔一年的第二次变形,而最让common君不可理解的是,在整个变形过程中,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的同时,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的,正是那张“绿化周时间”的传单。

与第二次变形相比,common君的第三次变形受政府“绿化”计划的影响更为直接。甚至可以说,common君是受到了以下这则广播的指引,才来到了刻有明显战争迹象的“废墟”之地,并在那里发生了自己的第三次变形。

不知道哪里的广播开始说话了。

“现在正是绿化周时间。往来的大家,请互相爱护树木。植物,给予我们废墟般的心灵以调和,使街道变得清洁与美丽……”

(安部公房著,笔者译,1997:242)

这里不仅有“绿化周”的名称,更有政府“绿化”计划的具体目的与内容。因为“植物”可以调和“废墟的心”,“使街道变得清洁与美丽”,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植物”。这种宣扬,在即将变为“植物”的common君耳朵里,成为了一种催化剂,它瓦解了common君内心一直以来对于变形的抗拒,促使common君下定了决心变为“植物”。

自己本来没有注意到的传单,为什么会主动给自己“递眼色”?在变形发生之际,为什么眼睛里看到的只有“绿化周时间”的传单,耳朵里听到

的只有“绿化周时间”的广播?小说以寓言的形式深刻地刻画出的正是战后日本国民不想“看”而不得不“看”,不想“听”而不得不“听”的处境。从第二次变形的“丧失自信”到第三次变形的“痛下决心”,再到第四次common君终于在“绿化周时间里的花卉、植物日”彻底变为“植物”,带给common君内心巨大变化的正是政府对于民众思想的强行干预。至此,政府利用国家机器阻碍民众思想进步,利用媒体蛊惑民众使其自主变为表面为“人”实为“非人”的目的昭然若揭。

可是,按统治阶级意志下决心自愿变为“植物”的common君,结果却没有在第三次变形之际彻底变为“植物”。就在“变形”将要完成的一瞬,common君听到了H植物园长的呼唤。那么,H植物园长为什么要在此时出面阻止common君的变形?H植物园长在安部的笔下究竟又具有怎样的隐喻含义呢?

3 植物园长 与 海军军刀

其实,在common君即将完成第三次变形之际呼唤他的植物园长正是从他手里抢走K小姐的那个“发条糖般的高大男人”。虽然在此之前并没有正面接触,但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适时地出现在了common君与K小姐约会的咖啡馆,阻止了common君与K小姐的私奔。不仅如此,他还暗中监视common君的一举一动,在目睹了他的第二次变形之后,跟随他来到了common君发生第三次变形的、带有战争痕迹的那片“废墟之地”。就是在那儿,他第一次暗示了自己的身份。

“啊,蟹甲木。”

男人偷笑。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从口袋里拿出了亮闪闪的海军军刀。(中略)

“在内地还能采到蟹甲木,真是一件稀罕的事。”一边这样说,一边突然拿起刀,向着脚边的土地猛扎进去。(安部公房著,笔者译,1997:244)

一眼能看出 common 君的“植物”本质,对事态的全盘把握,说明他并不是正在发生变形的、表面为“人”实为“非人”的一般性质上被奴役的普通国民。同时,他在 common 君按政府的意志打算自主变为“植物”的时候出面阻止,也表明他并非是忠于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机器”。那么,在战争的“废墟”上,以政府对立面的形式出现的植物园长代表的可能是谁的利益呢?是森村优太所说的:“园长的存在,与其说是国家权力的支配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利己主义者”^[10]中的“利己主义者”吗?他口袋里“亮闪闪的海军军刀”或许是最好的指向性标志。

安部创作这部《蟹甲木》的时间是1949年,当时的人们尚未走出战争的阴影,而想到二战,恐怕不会有人忘记美国海军的存在。二战时美国最强大的就是海军,从欧洲战场到太平洋战场,从珍珠港事件到日本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美国海军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既然担任太平洋战争攻击日本主要任务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那么,安部小说中手持“亮闪闪的海军军刀”的则最有可能暗指美国军人。战后,日本虽然表面上被盟军占领,但实际上依然是被美军单独控制。远东委员会的本部设在华盛顿,主席为美国政府,“联合国所确定下来的基本方针都必须先送至美国政府,随后由美国政府向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发出指示”^[11]。所以,美军在战后的日本具有相当的参与、控制权。

如果说手持“海军军刀”的植物园长代表的是美军,那么美军与日本政府的关系,甚至是美国对于世界的野心,也可以通过安部的小说窥见一斑。H植物园长虽然在 common 君第三次变形的时候出面阻止,但是园长的真正目的并非阻止 common 君的“植物化”,而仅仅是希望 common 君最终在自己的“植物园”变成“植物”而已。而且,为了招募 common 君,H植物园长还特意强调了她的“植物园”在日本的特殊待遇。

我只是想来告诉你,我在H植物园为你提供一间房子。在那里有和母岛完全相同的气候。(中略)而且,得到了政府的保证。不会受到任何危害。现在变成植物的很多人,正在我那里过着最安稳的生活。

(安部公房著,笔者译,1997:251)

“政府的保证”在这部短篇小说中一共出现了4次,可见这就是园长自认为最值得夸耀、最具优势的地方。而当时的美军,也正如植物园长得到“政府的保证”一般,在战后的日本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多方庇护。他们不仅可以合法驻留日本,甚至可以随意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而日本政府却主动放弃了对在日美国军人、军属的审判权,可以说,美军在日本的权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支持,美军不仅在政治上,甚至在思想上也企图操控日本国民。他们表面上实施民主化政策、要把日本打造成“自由社会”,可同时却规定“出版代码”“广播代码”等,对传媒及出版业进行严格的监控(福井坤一,2016:32)。安部的这部具有明显反社会性质的作品,也正是由于披上了“超现实主义”的外衣,才得以逃脱当时严格的“思想检查(検閲)”。即使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作品切身感受到获得了“政府保证”,以“不受危害”为名,唆使丧失人格的“植物”(=日本国民)在自己的“植物园”(=殖民地)过“平稳”生活的美军在战后日本的嚣张跋扈与作家对殖民制度的深恶痛绝。

不仅是“植物化”的日本国民,H植物园长的温室里还居住着不同身份的“植物”,迎接各种特殊的“客人”。

“怎么样,来这吧,请尽快看看我的温室。盛装打扮的名人和他们的家人们,说好远道而来这里集合,你看,这样,植物们也都装饰好了。每一片叶子都打磨好,在上面装好了万国旗。今天让我们热闹一天吧……”

(安部公房著,笔者译,1997:252)

装饰着“万国旗”的各色“植物”们正在等待着的是“盛装打扮的名人和他们的家人”。将各国的被剥削阶层“植物化”，为资本主义的统治阶层服务，美国在思想上渴望控制世界的野心在安部的小说中得到了意味深长的鲜明刻画。美国口中宣扬的公平、民主、自由的政策，在这样一个阶级明显、贫富悬殊、毫无自由可言的“植物园”般的现实社会中被抨击的体无完肤。那么，代表美军的“植物园长”选择园中“植物”的标准是什么？他为什么不在 common 君前三次变形之际就直接将他带入自己的植物园中？其间隐含了作家的哪些思想暗示？又希望带给读者怎样的思考呢？

4 被命名的意义

在 common 君的第四次变形之际，H 植物园长将它“放入了一个大花盆”，并将写有“Dendrocacalia Crepidifolia (蟹甲木)”的卡片“结结实实的粘在了 common 君的树干上”。至此，H 植物园长完成了自己将 common 君收入园中的计划，更完成了自己为 common 君“命名”的过程。因为“无名的东西是不可能被理解的”^[12]，所以“收容”与“命名”本身意味着对 common 君的理解与控制。从被 H 植物园长“命名”后的夸张表情中可以读出，此举对他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不知道为什么园长止不住的笑起来。就算想树立威严，从齿缝，从唇间，总有控制不住的笑容漏出来。园长终于大笑了起来。

(安部公房著，笔者译，1997:254)

H 植物园长为什么会将对连“新来的助手”都认为“大概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家伙”产生如此特殊的情感，甚至无法抑制住内心的喜悦而“大笑”起来呢？这一笑容中影射出的是园长对收容“蟹甲木”的迫切性与成就感。其实，“蟹甲木”对园长的重要意义早在第三次变形发生之际，从园长将其称作“蟹甲木”之时就已经表露了出来。因为他一眼

便看出了，眼前的这个 common 君虽然本质上也是一株“植物”，但它是“只有在小笠原母岛才有的极其珍贵的植物”，换句话说，common 君身上显示了一种因产于“外地”而带有的“稀有性”。也正是这种“稀有性”使得 common 君身上蕴藏着一般“植物”所没有的精神力量。

回到家，从里兜里取出上次那封信。(中略)连读也没读，在寂静的角落处把它撕碎。在一张上点火，还没灭的时候将火移到下一页，凝神看着一页一页全部烧尽，common 君不知什么时候将注意力从信移到了火焰本身。

女人正在燃烧。女人正在烧焦。(中略)或者，这正是普罗米修斯之火？是为了从山上驱逐人类压制者杀害父母的宙斯一族而被送来的火焰吗？

(安部公房著，笔者译，1997:249)

能够从燃烧的信中发现“普罗米修斯之火”，正是 common 君区分于普通“植物”的重要标志。也正是从意识到“普罗米修斯之火”开始，common 君发生了精神层面的本质变化。他发现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变为“植物”的故事，其实并非是一种“被解救的方式”，为了逃脱太阳神阿波罗的掠夺而将达芙妮变为月桂树之举也并不能带给达芙妮真正的幸福。其本质至多是“在摆脱不幸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幸福，从罪孽中释放的同时被投入到惩罚中而已”。意识到“宙斯”企图奴役人类之真实面目的 common 君，也意识到了招募自己的 H 植物园长其实是“为了扑灭火种”而来的“地狱怪鸟”。于是，他在勇敢地喊出了“地狱的怪鸟！不要扑灭我的火焰！”之后，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一天早上，天还没有全亮，common 君轻轻地离开了房间。将从地狱之鸟处得到的海军军刀放在了口袋里。最早的电车发出了喘息的声音，终于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我都无法逃脱变为植物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是自杀者的我。既然被死亡追赶，就没有了毁灭身体的不

安。我要杀死地狱之鸟。杀死夺取人间火种的地狱之鸟。可能的话,我还要救出那些被困在温室中的同伴。(安部公房著,笔者译,1997:252)

明知自己无法逃离变为植物的命运,但依然下决心要“杀死夺取人间火种的地狱之鸟”,“救出被困在温室中的同伴”。此时的 common 君,已经做好了仿效普罗米修斯,为了给人类带来“光明”而被绑高加索山,每日忍受风吹日晒、鸷鹰啄食的心理准备。可以说,怀揣“解救被囚禁的灵魂”之崇高思想的 common 君,其本质已经不再是对自身“处境”视而不见的、处于“自欺”状态的普通“植物”,在他身上蕴藏着的是一股渴望改变“处境”的力量,一种对“光明”的追求与向往。也正是这份对“光明”的向往,使得 H 植物园长“对 common 君的存在产生了切实的危机感”(森村優太,2015:145),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其收入自己的“植物园”中。在 H 植物园长的眼中,这种对于“光明”的执念正是“恶”之源泉,所以,他将收入园中的 common 君最终“命名”为代表“恶的植物”^[13]之“蟹甲木”。

回归小说创作的1949年,当时美国的对日占领方针刚从“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转为将日本建成“反共防波堤”(福井坤一,2016:126)。GHQ 不仅让军国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党徒回归社会,还开始推进以清除共产主义分子及其同情者为目的的“红色清除令”。作为因为思想上靠近共产主义而遭到封杀的先锋派作家,安部公房将自己对光明的执着向往和与敌人殊死搏斗的决心通过 common 君的言行昭示了出来。所以,小说中的“蟹甲木”暗示的应该是国民中具有先进思想的共产主义者。虽然小说依然是以“蟹甲木”被 H 植物园长“收归”为结局,其间渗透出的是作家对“现实”的无奈,但文中“如果大家不携起手来,就不能保护火种”的呼吁,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作者渴望拯救时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5 结 语

“废墟的心”是战后日本的时代精神状况。它是战争的直接后果,是“自我”不在场而导致“人格”丧失的直接表现。安部公房正是通过“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使“人”的这种“内在”之精神空虚通过“反转”而“外化”于身体,从而使“人”变为没有自控性的“植物”。文中对于“植物病”乃是“世纪病”的呼吁,渴望“震醒”的是在“自欺”的状态下无法自拔、无能为力的,表面为“人”实为“非人”的日本国民。

使国民患上“植物病”的始作俑者正是日本的统治阶级。他们通过“绿化”计划(=愚民政策)磨灭国民的斗志与反抗精神,使其始终自觉自愿地处于“自欺”的“植物化”状态之下。而持有“海军军刀”的美军则是日本政府的帮凶,他们在获得“政府保证”的基础上,企图通过将“植物化”的国民收归“植物园”之途径,达到自己“殖民统治”的目的。“命名”的根本意义在于“定性”,享有“命名权”的植物园长正是通过“命名”使得具有先进思想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被定性为“恶”,从而面临被日本政府以及美军双重镇压的窘境。

小说创作之际思想上开始接近共产主义的安部公房,正是怀着“共产主义战士”的使命感在 GHQ 血洗共产主义的白色恐怖下,借助“超现实主义”的外衣深度刻画了处于社会底层的日本国民在思想上受政府与殖民主义共同愚弄的残酷“现实”。即使是无法逃离被“命名”的厄运,文中洋溢着的对“普罗米修斯之火”与“春天”的向往,依然表达了作者鲜明的政治立场与革命态度,也正是这种抗争到底的执念,才使得安部公房在完成这部小说的同年,唱出了一曲《世纪之歌》(1949.3.15):模仿木乃伊/为了在灭火的家伙到来的时候/我们自身也能成为火焰(笔者译)^[14]!

[本文为陕西省社科基金“安部公房文学的‘现代性’研究一以‘变形’小说为中心”(项目批号:2017J029)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王晶]

注

- [1] 顧琦淵.安部公房の『アヴェンギャルド』—昭和二十三年から二十五年までの創作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に[J].国文学,2017(5):346.
- [2] 安部公房.安部公房全集(第五卷)[M].東京:新潮社,1997:442.
- [3] 田中裕之.安部公房文学の研究[M].大阪:和泉書院,2012:70.
- [4] 小林治.昭和二十年代の安部公房短編作品について(二)—変身と身体をめぐって[J].駒沢短大國文(30),2000(3):65.
- [5] 鳥羽耕史.運動体・安部公房[M].東京:一葉社,2007:105.
- [6] 安部公房.安部公房全集(第二卷)[M].東京:新潮社,1997:235.
- [7] 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30.
- [8] 吴美姪.安部公房の<戦後>植民地経験と初期テキストをめぐって[M].東京:クレイン,2009:69.
- [9] 邹波.安部公房小说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03.
- [10] 森村優太.「デンドロカカリヤ」論[J].佛教大学大学院紀要文学研究科篇(第43号),2015(3):145.
- [11] 福井坤一.重读日本战后史(骏台预备学校讲义录)[M].王小燕、傅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26.
- [12] 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81.
- [13] 李貞熙.安部公房『デンドロカカリヤ』論——または、「極悪の植物」への変身をめぐって[J].稿本近代文学,1994(11):152.
- [14] 安部公房.安部公房全集(第二卷)[M].東京:新潮社,1997:230.

作者信息:王晶(1979—) 女 汉族 西安交通大学日语系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oosyoo@163.com

The meaning of 'being named': A perspective on Abe Kōbō's *Dendorokakariya* [Dendrocacalia Crepidifolia]

Abstract: Abe Kōbō (1924-1993) wa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Japanese post-war school. By virtue of his surreal writing style and 'allegoric' means of expression, he was able to evade the literal suppression of the post-war government and the 'red purge' of the occupying forces, and penetrated the devastated spiritual world of the public underneath the gui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endorokakariya* [Dendrocacalia Crepidifolia] maintains a strong hope for communism and aims to save the 'prisoned souls'. It not only reveals the spiritual destructio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reflects the author's sense of mission entrusted by the era, but also expresses a yearning for 'light' and 'spring' in the 'darkness'.

Keywords: Abe Kōbō; *Dendrocacalia Crepidifolia*; surrealism; communism; post-war

Author's Information:

Wang Jing (Female) Year of Birth: 1979

Lecturer a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oosyoo@163.com